

大国综合优势和大国综合症

Scale and Development of a State

吴忠民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一

一个国家规模的大小是其特有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具体发展进程。无论小国还是大国都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和不利之处。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因之所形成的大国综合优势和大国综合症表现得也尤为充分。因此,正确地认识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综合症,不仅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这是确定中国合理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条件。

大国的综合优势和综合症其根源何在?

首先,国家至上,决定了国家规模具有重要意义。大国的一切发展均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而进行的。用现实眼光来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判断现代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是看发展的结果是否有利于国家。一旦国与国之间在根本利益方面出现矛盾和争端,国家规模的大小便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本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其次,大国社会机体本身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大国的综合优势和大国综合症。国家大意味着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幅员广阔的空间,与规模较小的国家截然不同的是,其社会机体的整体与部分两者关系的非加和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国的构成因子、子系统一类的变量因素是很多的。这也就注定了大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更大的伸缩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国的优势和不利之处更有可能呈指数型的累积和增加。推究起来,其原因无非有这样几个:其一,大国这种庞大社会机体的构成要素之间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联动和联滞的关系。某些要素或某一项重要要素的变动或停滞,势必会带动其他诸要素的变化或停滞。这种变动或停滞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比如,后发大国

的人口问题就极有可能影响其他要素,造成社会的大问题。其二,大国的整合方式有较大变化的可能性。大国由于自身机体各种环节过多,整合方式也势必相对复杂。一旦整合方式得当,则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时大国的优势呈现出一种最佳态势,反之则反。其三,毫无疑问,大国蕴藏的总能量(包括自然性的能量和社会性的能量)是巨大的,但其具体的现实兑现的结果则可能很不相同:或由于社会机体要素缺乏简洁性,同一类事物重复存在,使大国的总能量的兑现呈分散化的状态,整个社会机体的生命力表现出一种弱化的状态;或虽然总能量并没有被分散消耗,而是比较集中地释放出来,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定向,造成一种偏执型的社会机体;还有一种可能,总能量得以集中而有效的释放,从而使社会机体表现出一种强劲的势头。在现实社会中,上述三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规模较大国家所特有的总体效应: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综合症。

再次,各国间愈益加强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各个国家主体性的具体形态,并进一步强化了大国所特有的综合优势与综合症。世界性的开放大趋势导致了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加重。但由于各个国家在发展水准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交流并不一定都是有益的。如果某个国家被动地介入这种交流之中,便极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被对方不规则地同化了,从而受到较大的损害,沦为以对方为中心的外围国家。相反,主动地参与这种交流则是有利的。问题在于,被动、主动与否并不单纯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多种客观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国家规模的具体状况。规模较大的国家,由于自身机体的庞大以及内部结构的复杂,相对来说很难被别的国家非对等地同化,很难毫无选择地接受对方的幅射。这种较强的主体性在不同的条件下,既可能导致大国的综合优势,

也有可能导致大国的综合症。如果把握得好,这种主体性就会使本国的发展进程比较正常的进行,而不会由于受别国的过分影响而出现摇摆不定的状况;如果把握不好,便极有可能陷入固步自封,不自觉地扭曲了开放进程,从而对本国的发展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

在研究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综合症时,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1) 国家规模的大与小,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于国家规模的大或小不应简单地作出孰好孰坏的结论。应当科学地分析这一现象,以便在确定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时,尽可能地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推进发展进程。

(2) 对于大国综合优势和综合症不宜一概而论。同样是大国,由于历史基础、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民族构成及传统的不同,其综合优势和综合症的具体表现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里,其综合优势和综合症也有可能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因此,研究大国优势与综合症时不仅仅要研究多数大国(尤其是后发大国)所具有的某些普遍性的重要特征,还应进一步研究大国之间及内部差异的大小,亦即大国具体类型的特征。

(3) 判断、确定大国的优势或劣势,应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为基本参照。

(4) 不应将此项研究的意义过分夸大。国情是确立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基本依据。而国家规模的大小,只是国情有机组成中的一个部分。过分夸大这项研究的意义,在客观上会削弱、淡化人们对于国情其他方面的把握。

(5) 这项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学术性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发展学、社会学、地理学,甚至还有军事学等多种学科。只有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成功。

二

大国的综合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国家安全提供一种比较坚实的保障。

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把国家安全视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惯常的、不视为问题的事情。实际上,国家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能否持续进行的大问题。因此,在考虑有关国家发展这类问题时,应当首先注意到这一点。

国家规模大,其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量,可以有效地起着一定的防御作用。国家大,意味着国土幅员广阔,可以为国家的防御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且,一般说来,国土大,就意味着自然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战争潜力;国家大,还意味

着人口数量多,意味着兵源充足,动员潜力大,可以经得起战争的消耗。

第二,大国的综合国力容易迅速增强,进而使国家容易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重要的地位。

综合国力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社会等方面的绝对实力,以及资源调集、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等方面重要能力的总和。由于综合国力看重绝对量,所以,大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容易具备很大的优势。

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世界重要地位的确立,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益处:

(1) 使国家安全更加有了保证。

外来侵略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即便是本国人均军事费用在一定范围内低于别的国家,本国的安全仍不会出现大问题。于是,这里被节约出来的资金便可用于他途。

(2) 可以将别的国家对自己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如果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很弱,而又仓促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体系,那么,一旦与之有联系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它便会相应地承受损失,而且,又由于缺乏抵制对方转嫁危害的力量,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会更大。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如果很强,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3) 综合国力强,也会提高本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

第三,发展的潜力大,回旋余地广阔。

大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

(1) 作为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数量大,种类全。这就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保证了其正常发展,而不致于受制于他国。

(2) 国内市场广阔。大国不仅可以通过开放进入国际市场,而且,还可以大幅度地开掘国内市场。小国则必须打入国际市场,若一旦受阻,其被动情形可想而知。

(3) 国内各个区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协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大国的这种优势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优势的存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使这个国家不致于受制于国内、国外一些偶发性事件的不利影响,而得以持续发展。

第四,有利于一些大型现代化工程的建设。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与之有关的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这些工程是必不可少的支撑点、带动点和幅射点,是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骨架。没有它们,发展进程便有可能由于基础不牢导致后劲不足,或者由于部门、结构不完备,导致畸形发展。

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要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最缺乏的是资金和技术力量。规模较大的国家在自身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将资金、技术力量集中起来,投向亟需建设的项目,从而有效地推动大型现代化项目的建设。以我国为例,自1949年至今的40多年里,将有限的资金、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建成了一些大型现代化项目,它们在我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五,容易形成发展本身较大的惯性。

大国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许比较难以启动。但是,与小国不同,大国一旦得以真正启动,便很容易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惯性。这种情形是由大国所具有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显现出来的)强大的整体整合效应所造成的。如前所述大国自身机体极端复杂,各个部分、各个环节错综复杂地构织在一起,因而具有很强的联动性。所以,各个环节、各个部分一旦具有了发展的性质,它们相互间就会产生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形成一种巨大的发展的“势”,亦即发展的惯性,而且,这种“势”在一定时期里呈指数扩张。

在发展本身的这种强大惯性的作用下,社会成员更容易趋于对现代化的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的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力量。而且,在这种强大发展的惯性面前,许多属于偶发性的障碍很难阻断发展的整个进程。

三

大国的综合劣势亦即综合症主要表现在:

第一,内涵型发展的艰难。

虽然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型发展的过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后发大国,这种转变是很艰难的。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多是以外延型的发展方式为主。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外延型的发展就会逐渐过渡到内涵型的发展。但是,在后发大国中,这种过渡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以中国为例,1989年中国劳动力资源总数为68 364万人,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为80.9%,也就是说有一亿多劳动力是剩余的。而且,这种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极有可能呈逐渐增大的趋势,1990~2000年每年仍有1 500万人进入劳动年龄。而内涵型发展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提高又往往意味着大幅度裁减劳动力数量。这个问题若解决不好,不仅是浪费了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结果往往是以放慢内涵型发展为代价来缓解劳动就业压力。另一个原因是,后发大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必须看到,如果不及时地转变为以内涵发展为主,将会长期损害整个发展进程:人均产值很难迅速提高,造成生产的低效性,使大量的资源、资金、技术力量被无端地浪费掉;整个发展过程尽管数值不断增长,却很难得到实质的发展,这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

第二,社会成员较为普遍的怠惰心理倾向。

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形成一种积极奋进的社会精神极为重要。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社会性的怠惰心理倾向。后发大国这一情形表现得尤为突出。地大物博是大国的一种优势,但是这一优势有时会使人们产生一种安全的感觉,并有可能进而变得盲目自大,或者固步自封、消极怠惰。对于许多后发大国来说,都曾经历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国家的独立。独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民族解放运动所带来的一种积极奋进精神的惯性。但是,或者是由于这种惯性的被滥用,或者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惯性逐渐消失,积极奋进的精神也随之逐渐消失。和平时期,最容易激发人们奋进心理的是对外开放。许多中、小国家通过开放深感自己之落后,形成了一种危机感,获得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又转为一种积极奋进的动力。但对大国来说,由于领土过大,人口过多,大国的对外开放也只能是集中于沿海的某些区域,普遍的社会成员总的说来很难直接感觉到外在的压力而形成危机感。因此,大国通过开放所形成的奋进精神,往往范围不广,强度不大,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怠惰心理倾向。

社会成员的这种怠惰心理倾向对于发展进程危害不小,它使发展在启动时期缺乏应有的精神动力。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发展达到了一定阶段,发展本身才会出现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因此,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始初阶段特别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动力。而这种精神动力的匮乏,有可能会延长这一启动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种健康的精神动力,在发展的始初阶段,大国的社会成员又很可能会缺乏认同感,缺乏同一种价值体系的维系,因此,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规范很有可能是趋于混乱,从而直接有害于发展进程。

第三,社会控制系统本身更容易出现失误。

大国的社会控制系统是庞大的,这意味着系统中各种环节过多,而过多的环节又意味着出现故障的机会过多。这些故障最有可能发生在以下几个环节。

(1) 信息处理方面。在庞大的社会控制系统中,信息的反馈具有多层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信息需要一级一级地向上传递,而且,信息的总量很大。当信息到达控制中心后,控制中心并不一定有

足够的精力对于庞杂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况且,经层层传递后,信息必定失真。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信息的庞杂和失真,会使整个的控制行为出现失误。

(2) 费用过重。社会控制系统在后发大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一旦这一系统缺乏必要的监督而任其自然膨胀,必定会过度地扩充这一系统的机构和事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财政开支来予以维持。结果,费用过重,效率更低。

(3) 控制措施的迟滞性。信息的层层传递需要时间,而机构的庞大又使整个控制系统效率降低。控制中心即使制定出某些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也往往因滞后于情况的新变化,失去意义。

社会控制系统的这种失误对于整个发展过程将产生不利影响。首先,它会削弱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动力。比如,这一控制系统的指令往往是从控制中心发出的,因此极不利于调动各个区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利于各区域之间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庞大的费用,又会挤掉一些本来可以用作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建设的资金。这些,无疑是在削弱现代化过程的动力。其次,它会增大发展过程的摇摆程度。这类失误还会进一步造成决策失误,或者是执行决策过程中的失误;对失误进行修正性的补正,往往收效也不大。

第四,利益的制约力过多。

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转型时期,社会机体内部的各个环节在利益方面会出现分化现象。这在大国表现得更为充分、更为复杂。国家越大,各个区域的实体意义就越大,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的总人数就越多,必定形成更多的利益制约力。各个区域是利益实体,因而各区域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就势必会形成不少的分化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地理位置、历史的原因所决定的各区域的原来产业结构这时会出现更加不平衡的状态。比如,沿海区域的工业会发展更快,而且会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外向型色彩;内地的产业结构相对说来要更为落后一些。两者形成了二元结构的明显特征。二是各区域之间在收入方面的矛盾和摩擦。起步早的沿海区域,其发展水准自然会高于起步晚的内陆地区,收入方面因之出现显著差距。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样也会急剧分化,群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加剧。

上述种种矛盾与摩擦,对于发展过程会形成一种有害的阻力。它必将弱化中央的调控能力;加重各区域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不平衡性;增大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裂痕,削弱向心力;造成各区域、各社会群体某种程度上的短期行为。所有这些,对于发展无疑会产生消极破坏作用。

第五,资源合理流动难度较大。

资源的合理流动,对一个国家保持正常、顺利的发展极为重要。但后发大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资源合理流动难度很大。究其原因:

(1) 大国对社会稳定的要求度与敏感度一般来说比较高。为了尽可能地保持稳定,大国倾向于劳动力小幅度的流动,并往往用政策来控制。这样,求稳定与资源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相互抵销的现象。

(2) 大国的经济资源总量大,分布范围广。因此,一旦某一方面、某一环节对资源发出了一种需求讯号,过量的资源就极有可能从各方趋于该处。这种不合理的资源流动,很容易引起经济秩序紊乱效益下降。

(3) 各区域本位主义严重,因而很有可能人为地设立一些障碍,限制区内外资源合理流动。

资源合理流动受阻,必定造成资源的浪费或闲置,而且,无法有效地缓解区域性的或是部门性的某些瓶颈现象。

四

我国是一个大国。无疑,大国综合优势与大国综合症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正是这个重要参数的存在,决定了我国的发展须以平稳递进为主。平稳递进的发展模式具有民族主体性、持续性、起伏幅度小等重要特征。同别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必须按此模式展开,没有其他选择。一方面,大国综合症决定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本来,我国的控制系统就容易出现故障,我国社会的各种制约力与摩擦力就比较多,如果操之过急,就极有可能加重原有的综合症所产生的负效应,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进而使正常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因此,有必要在尽量稳定的条件下去推进发展。另一方面,大国综合优势又使平稳发展成为可能。大国安全保障能力强、综合国力容易提高、国内回旋余地大,这些无疑会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消除外国对中国的可能控制或不利影响,消除不少潜在的偶发性不利因素的影响,从而增大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一旦中国的发展基础达到一定程度,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强大的惯性力量,从而使平稳发展更加可能。

为了保证中国发展的平稳递进,应特别注意:

(1) 强化民族凝聚力。其作用在于减缓各区域、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使之不至于过分激化;其作用还在于为整个发展过程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使发展始终能够保持递进的势头。

(下转第13页)

为增强融资能力,日本设立了海外协力基金。进出口银行和海外协力基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中长期出口信贷扶植机电设备出口。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BANK)的主要职能是向美国出口商提供必要的出口贷款支持,特别是为促进本国大型项目和设备销售提供利率优惠的中长期贷款。

“七五”时期,我国出口卖方信贷规模逐步增加,目前贷款余额约为13亿元,但这远不能适应机电产品出口较快增长的需要。由于出口信贷得不到保证,一些出口经营单位不敢大胆对外成交,从而经常失去效益好的成套设备投标机会。

第三,要求提供出口信用保险。为了减少出口经营者的收汇风险,国外和境外都有比较健全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例如,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是全部由政府资金控制的专门保险机构;澳大利亚出口金融和保险公司、英国出口信用担保局是政府设置的特殊部门;法国COFACE,德国HERMES & TREUARHEIT PUBLIC AGENCY是政府和私人的合营机构,实际是政府的代理机构。我国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要内容的出口信用保险从1989年开始实行,目前仍属试办性质,规模很小。随着出口自负盈亏机制的不断完善,出口市场的多极化,出口合同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特别是延期付款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的增加,经营风险将更加变化莫测,出口经营者寻求出口信用保险的欲望越来越迫切。因此,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是扩大机电产品出口的迫切需要。

第四,提供成套设备出口保函。我国大型成套设备投标和合同执行一般都要由金融企业出具保函、包括投标保函、履约保函和预付金保函。履约保函金额一般为投标项目合同总金额10%以上,有的要按合同总价保函。近年来由于国家规定的准予中国银行提供的授信额度备付金限额突破较多,难以向出口经营者提供保函。出口经营者申请保函,必须以付出相当于保函金额一定比例的现汇交银行抵押,银行才出具保函。这笔沉重的资金抵押严重影响了经营者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影响了投标竞争力。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第五,要求金融企业开展贴现业务。贴现业务是国外金融企业的一项正常业务,在我国还没有正常开展。机电产品特别是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合同成交额大,付款方式灵活,付款周期较长,出口经营者为了加速资金周转,满足资金需要,迫切需要银行开展贴现业务。

第六,搞好搞活外汇调剂市场。出口取消补贴,由经营者自负盈亏以后,外汇额度成为出口经营者补偿出口成本的重要手段。外汇额度能否及时调进调出成为出口经营单位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关键。在人民币汇率仍不能反映真实本币币值

的情况下,外汇额度就将是宝贵的,作为外汇额度调剂场所的外汇调剂市场就必须存在。为了扶植扩大出口,国家必须加强外汇调剂市场管理,促进搞好搞活外汇调剂中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作为扶植机电产品出口的重要手段,应当具有:

(1)及时充足性,就是必须按照国际市场变化和开展外贸业务活动的需要,从时间和数量上及时足额地得到资金贷款保证;

(2)政策扶植性,固定资金贷款、流动资金及中、长期出口信贷,都必须实行优惠的利率;

(3)有效保障性,出口信用保险、成套设备出口保函等都要求对出口产品和出口项目给予有效保障,使出口经营者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础上,大胆开展对外贸易业务。

保证这些特性的实现,要求建立一个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专门金融机构。目前,我国扶植外贸出口和机电产品出口的金融政策由中国银行执行。由于中国银行一方面是一个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承担上交国家利税的任务,从这一点出发,获得盈利必然成为它重要的经营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对外贸出口的金融扶植政策,主要通过中国银行执行,不得以营利为目标。以上这两种职能客观上是矛盾的。怎样才能充分发挥金融扶植机电产品出口和对外贸易的功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实体,承担这项职能?应当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加快研究,尽快决策。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63页)

(2)超前发展教育事业。前面曾经谈到,我国剩余劳动力存量,年增量亦大,而且文化素质不高,从而构成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型发展过渡的严重障碍。障碍不除,从长远看,我国的发展没有希望。而发展教育事业,甚至是超前发展教育事业有助于消除这一障碍。通过普及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可以直接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为内涵型发展培养出能够胜任现代化建设的合格的劳动大军。

(3)大力改进、优化社会控制系统。社会控制机制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或者是控制中心权力过重,或者是随意将重大权力下放给区域的不正常现象。要确立起多级递阶控制的系统,既可克服过分集中控制的弊病,又可以克服过于分散乃至失控的弊病,还可以吸收集中控制与分散控制各自的优点。多级递阶控制系统有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还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并处理社会机体运转中所产生的故障。前述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发展的平稳递进提供必要的保证。(责任编辑 孙立明)